您好，潘先生

——夜读包天笑的《猩红》

孙超

“天气冷，别出门罢！”

这是潘太太对潘先生的嘱咐。读完包天笑192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猩红》里最末的这句话，已是午夜了。睡不着，脑袋里直蹦：“您好，潘先生”！

如果不是这场暴虐非常的新冠肺炎疫情，近百年前小说里的潘先生一定不会让我如此反复致敬。我呆呆望着窗外闪烁的街灯，思想的潮水从潘家夫妇的对话溯流而上。百年前后的上海正流行着猩红热，各家报刊报道着病例、分析着病情、探究着病因，寻找着治疗方法，那种情形和今天很像。《医药杂志》1921年第6期上说：

本病之特色在发热与固有之发疹，但病源尚未十分明了。

本病之传染经路：假定有一猩红热病人在此，与病人接近者易染此病，固不待言。即仅至病室问候，伫立少许者，亦可传染。……

本病之病毒常存于病人之血液、泪液、鼻洩、咳痰、尿屎及上皮落屑中。故以上之物，均宜注意。

本病侵入之门以扁桃腺为最多，亦有自皮肤之外伤侵入者。

本病之症候：病毒入身体后，至迟不过两星期即蔓延于全身。……

本病之预防：宜将病人严行隔离。病室衣服、病儿玩具，一切严行消毒……

本病之疗法：宜先注意于卫生。如病室宜广，空气宜良，食物宜用牛乳、鸡卵等之易消化而富于滋养者……

上述资讯也和当今媒体发布的有几分相像，只是用竖排，不用新式标点，那时还没有电视、微信、微博和短视频。可见，同与不同，百年一瞬，真是让人唏嘘感叹！不过，读了《猩红》，让我深觉应在同与不同处有辨。

《猩红》讲了一个“中等阶级”家庭在上海遭遇传染病猩红热，儿子、丈夫、妻子先后病死的故事，惹得人不由泪目。病毒的残酷仿佛样本复制，家人的相爱也如跨越时空。儿子染病去世，不仅粉碎了沈芙孙夫妇“明年仍在吴淞的时候，就把小孩子送到小学堂读书”的计划，还一下子掏空了他们的心。特别是为人母的沈夫人已被打击得全无生气，猩红热乘虚而入，不到三天，两颊通红，喉间也起了白腐。沈芙孙急得手足冰冷，带着病妻辗转求救。众所周知，传染病必须住院隔离、治疗静养，就如《医药杂志》上说的那样，小说里沈夫人后来也被送进了“中国医院”。可由于伉俪情深，沈芙孙夫妇完全忘记了务必隔离的提醒，在医院里常常相伴着。结果沈芙孙也被传染，竟早一步离开了心爱的妻子，离开了那个让他落魄的世界。

小说写沈芙孙夫妇在患难中相依相守纯用白描，感人至深，当我看至芙孙临咽气还指指女病房时，泪水便忍不住涌出来了。看着生活在同一时空中的同胞逝去，我不仅泪淋淋，而且汗涔涔。窗外的疫情还没退去啊，禁足的我涌出的岂止是同情？在平日的课堂上，我可以讲“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还可以讲“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哀情。今夜看着镜中我须发乱蓬蓬，想到的却是“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多少爱变成了永远的等待，多少情化作了无言的尘埃！

小说中的潘先生是热心的，芙孙在上海的短暂生活全靠他的“厚道”支撑着，他不过是芙孙久违的一个亲戚罢了。更何况潘先生近年也不顺利，因此他对于芙孙一家的道义担当真是难能可贵。芙孙是带着二十块钱闯上海的，潘先生在他囊尽之时慷慨地送他的也是二十块，并帮他谋到一份书记员的工作。在芙孙的儿子因患上猩红热死去时，他伸出了无私的援手，帮着丧葬。在芙孙的妻子也染上猩红热，几近走投无路时，他的举动更让人感动了。小说这样写道：

潘先生命人把一间客堂出空，索性搭了一张床起来……沈芙孙夫妇心中很觉不安，自己知道是传染病，潘先生家中也有小孩子等等。潘先生道：“不妨，我把屏门关断，不许他们出进，隔离了，不要紧。待你们去后，我再托人来消一回毒，也就无碍了。”到了明天，潘先生一早起来，绍介进中国医院，也到了午后方才送去。……

平实的语言活现出一位果敢、理智、懂防疫、有人情味的上海市民形象。自此以后，潘先生时常通过电话等方式关心着沈夫人的病情。小除夕，忙碌中的潘先生正预备送一二十块钱给沈芙孙过年，可就在这时，医院送来了芙孙病危的通知。春节前后，潘先生忙极了，忙着丧葬，又忙着丧葬。他也沮丧极了，为着因猩红热致死的一家人，为着由之损失的四百块钱。你看，潘先生多么平凡，但对于染上猩红热的沈芙孙一家而言又多么温暖。小说最后潘夫人那淡淡的答话“你也辛苦了。有人家送来的葡萄酒，你喝一杯。天气冷，别出门罢”，无疑丰富了他的平凡和温暖。与沪上只有一个朋友的沈芙孙一家相比，今天的我们可算十分幸运了。每当灾难降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深切地感到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团结。

四十多天过去了，我常常被一线忘我战“疫”的人们所感动，为疫情逐渐消退而欢欣。此次新冠疫情带来了说不尽的话题，可谓众声喧哗，有时逼得我无奈开启手机的飞行模式。“飞行”的时候，我偶尔会想：何时发出更多“文学”的声音？夜读包天笑的《猩红》，我看到了近百年前文学里真实的力量，真的事，真的人。那时候，撰社会小说重视写实，如摄影，认为无一事一语不真，方有价值；若参以理想，加以揣测，就变成画儿了。当我从《猩红》里看到近百年前的上海医院和居民如何处理传染病，我深信小说确有补史的作用，也为今天的进步感到高兴。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学不再瞩目于山林和贵族，而是更关注城市和平民。我相信，在当下这场战“疫”中有很多充满仁爱的平凡人；我期待，有一天作家们也写出属于今天的潘先生。

2020年3月3日

云边路

汉村寺

甫跃辉

汉村寺在哪儿？不在汉村，是在九龙。我所生活的那个村叫“汉村”，汉村以南是九龙，九龙以东，是“山后”，再加上汉村以北的“田坝心”，几个沿着山脚分布的小村子曾合称“大汉村”。分开来呢，每个村子只不过几十户人家，多是四合院，少有单门独院的。如今，人口增长，房屋也增长，单门独院的人家渐多，村舍已连成一片。只有当地人清楚，从哪儿开始，是田坝心，是汉村，是九龙，然后，是山后。我家在汉村最西，隔一条小路，便是九龙。再往南走两百来米，在小路转入山后时，左手边一座高高的大门，挂一块牌匾，上书“汉村寺”三个篆体大字，这便是汉村寺的大门。

汉村寺有这光景，是近年修葺的结果。

汉村寺的修葺，是一件大事。左近的几个村子里，善男信女们捐钱出力。房屋修缮了，围墙新建了，更重要的，是殿堂里真立起石雕或泥塑的佛像，墙壁上还绘了八仙过海、花开富贵之类的图画。

逢年过节，初一十五，汉村寺有庙会，用奶奶的话说，是“做会”。左近村子里的人都会来，来烧香拜佛，也来帮忙做饭。去的人不用交钱，可以吃一顿免费的素斋；只有“上表”才交钱。上一道“表”大概是五块钱吧？我至今不清楚“表”是什么。以前，奶奶是常去上表的，为我们祈求福寿。汉村寺离得如此之近，我竟从没去参加过一次庙会。听奶奶说过，那是极热闹的。哪怕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到了日子，奶奶仍然会去寺里，往往还要带上用龙潭边的香柏树枝自制的香面。直到近年，她腿脚不好了，才罢了这事。

我只在闲日子里去过。推开虚掩的大门，一进空落落的院子，右边偏殿里供奉财神，左边偏殿里摆着几张桌椅，好几次碰到老人们在那儿。他们看我一眼，又低头继续搓麻将。迎面一道景墙，爬几级台阶，穿过景墙，便是后院。墙角有个小花坛，蜀葵、虎刺梅、四季海棠、紫鸭跖草、一串红、豆腐叶花（天竺葵）等开得甚是恣意。大殿里，居中是观音，两边白墙上，绘了威严的十八罗汉。大殿挺高，瓦隙间阳光一缕缕射下，可见熏黑的梁柱。据说，半世纪前，汉村寺遭过一场大火，从此便不像个寺了，派过许多用场，先是办过一所小学，后来，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家在此借住，一住好多年；班主任余老师也在此住过一年。

那时的汉村寺，既没门楼，也没围墙，殿堂里更没一尊佛像。“汉村寺”只剩下一大片敞开的空地。空地上，残余的水泥东一块西一块，裸露的土地生发出种种杂草，高的有鬼针草、臭灵丹（翼齿六棱菊）、解放草（紫茎泽兰）等，匍匐在地的有牛筋草、马齿苋等。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繁茂又荒秽。

阿爸开货车那一两年，停车是件头疼的事。记得先后停过山沟边谢友松医生家、横沟小学、村口，还停过汉村寺。入夜了，我们一家还在车上。阿爸是在修车么？我不记得了。我和弟弟是在车厢里玩耍。同学家的灯火就在眼前，我看着他们一家人进进出出，吃饭、说话、做事，再看看不远处的大殿，黑黢黢的，不存在的佛像，在那儿低眉垂目。心里有种奇特的感觉升起，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种生活，而我只了解其中唯一的一种。

过年前，村里压粑粑，也常在汉村寺。小半个村子的人来了，机器嘎吱嘎吱运转着，冒着热气的米饭转眼压制成冒着热气的粑粑，瓷白耀眼，丰糯润实。到处是潮红的面孔，到处是欢悦的笑声。天高云淡，鸟雀啁啾，大殿屋顶，瓦松细瘦，摇举着小小的喇叭状的花朵。屋后几株高大的香柏树探出头来，幽森又寂静。我们一群小孩儿，纷纷跑上大殿石阶，从垂带石上滑下。那垂带石，不知被多少小孩儿的屁股磨过，触之腻滑，光可鉴人。

这样热闹的情形，一年不过一次。

比汉村寺热闹的，是寺门口的井。是一方四四方方的井，井口比路略低，早些年就这么敞开着，在我十来岁时，才用空心砖砌了三面围墙。我去挑水，有时是为家里挑，更多是为学校挑。我们从四年级开始挑水，三五个人一组，从横沟小学出发，走上两三百米，到这儿挑上水，再回到学校，将水倒满学校操场边桉树下的水缸，供全校学生饮用，再送几桶水到各位老师的住处。学校周围还有别的好几口水井，我们似乎从来没去过。就连离得较远的横沟寨子，也有人常到这儿挑水吃。这一口井水，清冽，甘甜，水底有几条鱼游动，皆看得一清二楚。水井底部靠南，有个大洞深入进去，鱼慢悠悠进去，许久，又慢悠悠出来。我时常在井边蹲了看，想那条鱼去了什么地方，那洞口是否通往传说中的龙宫。

挑水时，我们偶尔会踅进汉村寺看看。看什么呢？天还没亮，漫天的星，如没熄灭的炭粒。眼前不过是一片荒地，几间废屋，草茎里蟋蟀蚂蚱发出吱吱吱的声音。那时，同学家已搬往新房，汉村寺开始修葺，只是进度很慢。一些高大的石头立在黑暗里，石头的坚硬里渐渐展露出佛面的温柔。仿佛只需一口气，他们便能活过来。

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忙往外跑。担了水桶走，水桶摇摇晃晃，水洒到鞋面上。身后的黑暗里，是什么睁开了眼睛？

这天傍晚，一个消息不胫而走。杂技团到汉村寺来了！哪儿的杂技团？表演什么杂技？我们全然不知，也全然不管。吃过晚饭，我抹抹嘴，往汉村寺跑。紧挨着景墙的石基，一盏临时悬挂的白炽灯下，早有许多老人小孩挤挨着。我耗费了老大工夫，才挤进内圈。

似乎是一家人：两个兄弟模样的中年男人，一个中年女人，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还有一只说不出年纪的猴子。一个男人手拎铜锣，敲了几敲，用普通话说些“初到贵地”之类的场面话。大家木呆呆地看着，不吭一声。男人又敲了敲锣，似为了打破尴尬局面，又似为自己壮胆。咣咣咣的锣声，在幽暗的荒院里格外响亮。女人拉过一条板凳，一直沉默着的那个男人躺上去。敲锣的男人说，大家都在电视上见过胸口碎大石吧？有人亲眼见过吗？他看向大家，没人回应他。他接着说，电视上那些石头，其实多半是泥块，做不得数的。我们今天给大家表演个货真价实的……男人说话时，女人和男孩合力搬出一块砧板样的石头。谁来摸一摸？这是你们本地的大青石，绝对货真价实。大家呆呆看着。男人曲起指头，敲一敲，大青石当当响。女人和男孩将石头搬起，放到一直躺着的男人胸口。

站着的男人敲一敲锣，又说了一番话，人群里传出嗡嗡声。忽然，男人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柄铁锤，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他瞅瞅人群，笑着说，刚刚这是假的，现在来真的了！看好！高高举起铁锤，再次轻轻落下。人群里嗡嗡声更响了。男人笑，还是假的！真的真要来了！再度举起铁锤，梆！这次不用他说，我们也知道，是真的了。然而，人群沉默着。看好！男人咬牙说。梆！梆！一下又一下。每砸一下，大青石底的男人便头脚一翘。梆！梆梆！梆梆梆！挥锤男人咬紧牙关，满头大汗，早忘了说笑。人群沉默着。只听得金石碰撞声。

猴子吱吱吱叫，脖子上的铁链哗啦哗啦响。

梆！闷钝的一声，大青石终于裂开，慢慢从躺着的男人的两侧滑落。

人群静着。所有人静着。

躺着的男人还活着吗？我不敢想。挥锤男人扔下铁锤，伸手去拉躺着的男人。一个念头闪过，他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两只手握在一起，挣了挣，男人坐起，手柞膝盖，一动不动，只是喘气。一头蓬乱的头发，沾染了灰白的石粉。货真价实吧？挥锤男人擦一把汗，冲大家笑笑。白炽灯光昏昏地照着。男孩牵着猴子的铁链，猴子端着铁盘，慢慢从人群面前走过。人群沉默着，往后退一退。

黑暗里，只听见一两声金属相撞的脆响。

我默默退出人群。人群外，站立的石头们，已有更多的面目剥离出来。慈眉善目，怒目圆睁，抓耳挠腮，沉思默想，心不在焉……但一律沉默着。忽然，石头里似乎射出目光。我没看后面的节目，慌不择路往家跑。咣咣咣的锣声，一声一声一声追来。

和风拂林（彩色玻璃镶嵌）王希民 王康 李萧禾

笔会

听百岁作家欧阳文彬聊天

韦泱

欧阳文彬出生于1920年，是百岁文化老人了。屈指算来，也是上海文坛继罗洪（1910—2017）后，第二位迈入期颐之年的女作家。与欧阳相识二十多年直到今天，特别喜欢听她聊天，这于我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一种文化的滋养。

最早听欧阳聊天，聊的是她早年与《中学生》杂志的故事。九十年代我热衷于淘民国老杂志，旧书摊上见到《中学生》旧刊，就立马淘下。见到欧阳，就有许多提问。她说道，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开始学着写作。偶然机偶，结识了这家刊物的傅彬然、宋云彬两位早期编辑，在他们关心下，就成了刊物作者。1945年，开明书店创始人叶圣陶到重庆，检查店务工作后，又与书店所办《中学生》杂志的青年作者见面，经傅彬然介绍，欧阳认识了叶圣陶。几次交谈后，叶老对她留有很好印象。不久，傅彬然告知她，请她进开明书店工作，令她喜出望外。当时，她工作的新知书店重庆分店亚美图书社，因发行进步书刊，被特务强行关闭。为了不暴露新知总店，只能焦急地自找职业。叶老知情后，让傅彬然带话给她，使处在困境中的欧阳心生感激。很快，她从校对做起，成了刊物的一名编辑。

谈起叶老，欧阳有聊不完的话题。抗战胜利后，欧阳跟随叶老及开明同人，乘木船整整花了四十五天才回到上海。在虹口虬江路建起了开明新村。欧阳与叶老朝夕相处，学到了叶老等老一辈编辑家的优秀品格。按照叶老所要求的“心中时时刻刻想着读者”，即使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有一次，一批样刊正准备邮出，忽然发现了一个错字，立刻通知暂停，一一拆开改正后重新封寄。欧阳在《中学生》杂志任编辑，一直到1949年，在开明新村迎接上海解放。据此，十多年前我写了《听欧阳前辈谈〈中学生〉》，刊发在一家杂志上。

其实，在上海解放初期，欧阳还在翻译家董秋斯主编下，担任《翻译》杂志的编辑。这是上海解放后，由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一份翻译月刊，董秋斯是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欧阳是协会秘书长。她又在彭慧主持下，与六位女编辑一起，编辑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本妇女杂志《新民主妇女》月刊。聊得多了，承她信任，为她口述写作了《我在上海解放初参与编辑的报刊》一文，发表后她很是高兴，说“总算留下点出版史料”。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她在《新民晚报》工作十多年，担任报社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时还没有设党委）、副总编辑，与社长兼总编辑赵超构一起，努力办一份让新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新晚报。接着又担任《萌芽》编辑部主任。在改革开放后，参与创办学林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等。她的一生，没有离开过新闻出版界。

八十年代初，十分惊喜地读到欧阳与人合著的两部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幕，在硝烟中拉开》。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文学，欧阳脱口而出：“张天翼是我文学的引路人啊。”抗战烽火初燃，欧阳辗转考进从北平迁来长沙的民国学院就读，张天翼在该校讲授文艺习作课，欧阳读的是法律系，却执意选修了这门课，成为他的学生。每遇写作上的问题或困惑，就找张天翼请教。交谈多了，她有一次愣愣地问张天翼：“你小说中写了那么多人，有的是漫画式的讽刺人物，会不会有一天把我也写进去？”张天翼似乎看出她的心思，回答说：“那可不一定，要看有没有需要。不要以为写进小说是倒霉的事。”这所学院有许多文化名人执教，如吕振羽教中国近代史，翦伯赞教外国历史。教世界语的陈新老师，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欧阳毅然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演剧中，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十七八岁的欧阳，曾三次见到革命老人徐特立，听他演讲，更燃起追求光明的渴望。又在张天翼的悉心辅导下，作为他的文艺习作课作业，欧阳写下《开会》等两篇小说，经反复仔细修改后，由张天翼推荐给长沙的《观察日报》副刊编辑黎澍，得以连载发表。这是欧阳第一次发表的小说习作。四十多年后，她敢执笔写作长篇小说，这个底气接续了当年初写小说的勇气，也传承了张天翼的创作经验。那时，冯雪峰、丁玲、胡风、夏衍、聂绀弩、韩侍桁、彭柏山等，都对她的创作进行过辅导帮助。由于战事吃紧，一年后学院又得迁徙。欧阳因为经济窘迫，也是听从张天翼的要求：“到社会这所大学校去读吧”，毅然走上了一条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一条自学为主的成才之路。著名出版家、文史家丁景唐高度称赞《在密密的书林里》，说这是一部“革命书店工作者在党领导下英勇斗争、机智地把进步书刊传播到读者中去的长篇小说，这在我国文学作品中还是第一次反映这种题材”。此书被评为1981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幕，在硝烟中拉开》描写的是中共领导的一支由流亡学生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斗争故事。此书当年获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优秀图书奖。

欧阳说，“我自己最满意的是文艺评论。主要是推荐新人新作，很少评论名家已有影响的作品。”五十年代后期，女作家茹志鹃还未成名，欧阳写了《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是国内第一篇论述茹志鹃小说的评论文章。六十年代初她撰写《漫谈谢璞的作品》时，谢璞还是个初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八十年代初写的《读程乃珊作品随感》时，程乃珊还没有走红。同年发表的《关于几个中篇小说》，着重介绍赵长天的作品，赵长天那时还是个屡遭退稿的业余作者。欧阳的文艺评论集《赏花集》中，评作品重在艺术分析。书出版后，被列为大学文科参考书目，且很快再版，在文艺评论处于低谷时，这颇为不易。五卷本的《欧阳文彬文集》，除了诗歌，还包括小说、评论、散文、翻译、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各式体裁已然齐备。

聊文坛文人外，欧阳也会聊些家事。一次，她对我说：“我出生在美国哎。”于我听来，仿佛石破天惊。细细聊起，还真是大开眼界。欧阳的湖南籍父母是“庚子赔款”的赴美留学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分别是历史学和教育学研究生，并坠入爱河。临近毕业的1920年，欧阳降生在哥大医学院。后来由于祖父母已为父亲包办婚姻，而提倡男女平等的母亲，坚决只做妻不做妾，热恋中的情人难成眷属，不得不劳燕分飞。父亲黄士衡后来成为湖南省著名教育家，创办了湖南大学并任校长，两度出任省教育厅长，晚年任湖南省政协常委、省文史馆副馆长等。母亲欧阳骏带着女儿，终身未嫁，从事妇女解放运动，曾在南京组织“女子北伐军”，后任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一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母亲临终前，把欧阳唤到床前，交给她一个信封，说“我身无长物，只有一张纸，你随时可申请为美国公民”。欧阳拆开一看，哇，那么精致，原来是一张自己的美国出生证。这是母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

我说，能让我看看吗？欧阳说，早就一把火烧了，留它干吗，在特殊年代还会惹是生非呐。我不无遗憾地想，少了一件难得的纪念品啊。

“文汇笔会”微信二维码